

重勘 1985 年新小说

何 平

【摘 要】《新小说在 1985 年》是吴亮和程德培共同编选的小说年选,论文所论新小说不限于本年选。新小说新在哪里?新小说被谁定义、阐释和确认?在怎样的文学场域被定义、阐释和确认?新小说在 1985 年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论文重勘 1985 年新小说和它的文学现场。新小说不是发生在文学实验室的形式革命,而是由作家自觉的文学实践、批评家阐释、文学刊物发表、选本甄别、读者阅读和评奖推选等各种力量共同参与的形塑和建构。新小说不但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小说样本,而且确认并标识了它所想象的作家和文学圈层。新小说“时间开始了”的文学史意义虽然只是“在历史的断裂处裸露出的一个共时的剖面”,是新时期小说革命发展到 1985 年自然的结果,但也是新时期小说革命向未来的敞开。

【关键词】 1985 年新小说;小说革命;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

1985 年开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仍在进行中。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胡启立 in 开幕式致祝词。1 月 5 日新当选的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王蒙作闭幕词宣告:“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①祝词及闭幕词在文艺界激起热烈的反响。《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文艺》《当代电影》等报刊先后发表参会代表的笔谈。《新华文摘》也以“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为题转载了柯灵、袁鹰、王蒙、白桦、公刘、李存葆、蒋子龙和乌热尔图等的笔谈。^②除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文学史上的“杭州会议”,因为“与而后兴起的‘寻根文学’有着种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③成为 1984 年底另一个重要文学事件。但这种说法并不是唯一答案,参加会议的陈思和多年以后回忆:“平心想来,在那个会上,似乎也没有为寻根命名,或者提出类似宣言的倡议”,“当时大家的兴趣还是在西方现代派文艺方面,李陀等从北京来的作家们还是在不断鼓吹现代派作品”。陈思和还提到“杭州会议”的时代氛围——“人道主义思潮和西方现代派文艺又开始在创作中慢慢复活”。^④1985 年文学正是这种“复活”的症候或者说结果。

何平,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的研究成果。

①王蒙:《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文艺报》1985 年第 2 期。

②柯灵等:《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新华文摘》1985 年第 2 期。

③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当代作家评论》2000 年第 5 期。

④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4 年第 11 期。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984年先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①青年莫言谈到他个人写作的1985年：“我在1985年中，写了五部中篇和十几个短篇小说。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的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福克纳邮票大的小镇，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镇，两位小说家“立足一点，深入核心，然后获得通向世界的通行证，获得聆听宇宙音乐的耳朵”。以此为起点，莫言也要去“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②同一时期的批评家还在谈论莫言小说的感觉和意象，^③莫言已经被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和“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④所触发，开始了他1985年的文学创世纪。



1985年第1期《人民文学》全文发表了张光年的“作代会”报告《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该期“编者的话”毫不避嫌地推荐了主编王蒙的小说《高原的风》。自己推荐自己，这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是罕见的，但就整期杂志而言，并无多少新气象。变化应该到第2、3期才慢慢显现出来。第2、3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因为《棋王》被关注的“文坛新人”阿城的《孩子王》和“年轻的女作者”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⑤作为新时期初深具探索精神和最富创作活力的小说家，王蒙的小说引人瞩目，这种锐意进取似乎对他担任主编的1983—1984年《人民文学》影响不大。检索1983—1984年《人民文学》，远远不如同一时期的《上海文学》《收获》《十月》等。世人都云王蒙主编的《人民文学》如何新锐，但王蒙主编的《人民文学》不只1985年，而是包括1985年之前的1983—1984年和之后的1986年在内的总和。整体观之，1985年的《人民文学》和其前后两年相比，恰似突兀耸起的山峰，这正对应着时代的文学风向。谈论1985年文学变革，往往强调偏离和远离政治，获得文学的自觉，可能忽视了，恰恰是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政治对文学的慨然允诺才打开了1985年的文学空间。具体到《人民文学》，主编王蒙是小说家，也是政治人。王蒙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的研判，事实地影响到他主编的1985年《人民文学》。考察王蒙的精神构成，除了“少共情结”，还有文化越境和青年崇拜的底色，故而作为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的迎接者和领受者，王蒙个人的精神气质被充分地释放，激荡和灌注在1985年的《人民文学》。

1985年5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专门邀请全国各地最活跃的40位青年作家召开座谈会。马原、莫言、阿城、刘索拉、徐星、何立伟、周梅森、扎西达娃等新锐青年作家悉数到场。这些作家是1985年新小说的基本班底，先后都在1985年《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品。《人民文学》因此“成为声势浩大的新小说运动的旗手”。^⑥相比而言，1985年新小说的推动者之一吴亮回忆起1985年则淡定了许多。2008年，他接受杨庆祥访谈时说：“这一年实际上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假如我们仅仅是从发表作品看，比如《收获》、《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等，这一年确实有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韩少功的、莫言

^①黄锦炎等翻译的《百年孤独》，首印48500册。而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首印则高达87500册。此前，1982年10月，由赵德明等翻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列入“外国文艺丛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首印也达到42000册。其实，做个比较，中国文学新作首印数也不小，与《百年孤独》和《喧哗与骚动》差不多同期出版的张贤亮的《绿化树》首印21500册，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首印34000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首印17万册。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是在这个文学阅读能量空前释放的时代来到中国。

^②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

^③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84、197页。

^④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

^⑤《人民文学》1985年第2、3期“编者的话”。

^⑥朱伟：《亲历先锋小说潮涨潮退》，参见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的、马原的、阿城的。”^①尽管事后回忆中的感受有所不同,但1985年确实“打破了六十年中国文学的‘大一统’、‘定于一尊’的传统”^②。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就像当时一本1985年小说年选“编委的话”所说:“确认历史,方法极多,这一次是用小说。”^③用小说确认历史,这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方式,应该从20世纪50年代王瑶他们的“新文学史稿”就开始了。但事实上,这种“确认历史”的方法可能因为文类单一,对历史构成遮蔽,甚至歪曲。因此,虽然我们现在也“用小说”重勘历史,但需要提醒注意到1985年和小说同时在场的诗歌、话剧等其他文类以及“新潮艺术”的变革可能比小说更激烈。1986年9月,吴亮和程德培于年初编定的《新小说在1985年》正式出版。这个选本及时命名了正在发生的“新小说”。吴亮和程德培还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编选了《探索小说集》,和《新小说在1985年》同时出版。

入选《新小说在1985年》的小说家,除了陈放和刘心武,都有作品被选入《探索小说集》。《探索小说集》,只有孙犁、林斤澜、汪曾祺和吴若增等的数篇小说发表于1985年之前一两年,其余入选的小说基本是1985年发表的。因此,把《探索小说集》看作另一版本的《新小说在1985年》也未尝不可。王蒙和茹志鹃分别给《探索小说集》作序,他们的中心话题也都是围绕着小说之“新”。和《新小说在1985年》相对集中在方兴未艾的寻根小说以及取径域外资源形式实验的小说不同,《探索小说集》将新时期小说家更多面向的可能性,以专题单元呈现出来,比如说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和李庆西等的专题单元,编选者显然关注到笔记小说等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资源的当代转换和再造。顺便提及的是,《探索小说集》的编选思路可能影响到后来吴亮参与编辑的“新时期流派小说丛书”。^④

强调1985年新小说新的时间开始了的意义,应该意识到的是“历史的断裂并非线性过程的终止,并非异质空间的清晰划分,而是在历史的断裂处裸露出的一个共时的剖面”^⑤。新小说既是新时期小说革命发展到1985年自然的结果,也是新时期小说革命的历史向未来的敞开,故而《新小说在1985年》虽然是年度选本却有着自觉的总体性的文学史意识。1985年新小说是不是达到“声势浩大”的量级尚待仔细考证和深究,但说1985年是新时期文学革命的一个阶段性小结应该是事实。取得这个文学革命的阶段性成果涉及和新小说相关联的新文学观念如何形成,也关联到形成过程中各种文学立场和力量之间的博弈,包括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比如包括此前冯骥才、李陀和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在内的文学界广泛的现代主义文学讨论的预演,就是1985年新小说的一个重要前史。^⑥

二

《新小说在1985年》入选小说共20篇,其中韩少功3篇、莫言2篇、刘心武2篇(均为纪实小说)。^⑦

①吴亮等:《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②夏衍、李子云:《文艺漫谈》,《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

③《1985年小说在中国》,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编委的话”。

④“新时期流派小说丛书”由吴亮、章平和宗仁发编,包括《现实主义小说》(上、下)、《结构主义小说》、《荒诞派小说》、《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民族文化派小说》等,1988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春)出版。

⑤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⑥1982年,冯骥才、李陀和刘心武曾以通信的方式讨论现代派的相关问题。这三封信件分别为:《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和《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参见《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⑦纪实小说,刘心武一人入选两篇,而1985年在《收获》《上海文学》《钟山》《作家》《青年作家》等八家文学期刊同时发表《北京人》系列的张辛欣和桑晔无一篇入选《新小说在1985年》,显然不是因为《北京人》发表的时候标注为口述实录报告文学,《探索小说集》就收入《北京人》的两篇。个中原因,尚待研究。

《人民文学》共有6篇小说入选《新小说在1985年》，分别是《爸爸爸》《花非花》《无主题变奏》《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以及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排在其后的是《上海文学》和《北京文学》，都是4篇。《收获》入选一篇，为贾平凹的《天狗》。入选一篇小说的杂志还有《芙蓉》《十月》《中国作家》《西藏文学》《文汇月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位列前三，确定了它们在1985年新小说重镇的地位。文学期刊和新小说之间的关联性，可以从为《探索小说集》作序的三人的身份看出端倪。1938年入党的严文井，曾在延安鲁迅文学院文学系任教，1961年即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1985年，严文井仍然是《人民文学》唯一的顾问。而王蒙1983年开始任《人民文学》主编，茹志鹃当时是《上海文学》副主编。

不是从1985年才开始，比《人民文学》更早，从新时期开始，《上海文学》一直是新文学观念以及现代派、寻根文学实践的推动者。令人意外的是，反思文学中有出色表现的《收获》，在《新小说在1985年》仅一篇小说入选。其实，1985年《收获》发表过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第1期）、扎西达娃的《巴桑和她的弟妹们》（第3期）、徐晓鹤的《院长和他的疯子们》（第3期）和张承志的《黄泥小屋》（第6期）等小说，它们也都符合新小说的标准，尤其是第5期，几乎是1987、1988年新潮小说专号的预演，除了王蒙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球状闪电》和马原的《西海的无帆船》集体登场。莫言和马原的作品都是典型的1985年新小说。

《人民文学》1985年第2期集中发表了湘籍小说家韩少功、叶蔚林和王一武的3篇小说《爸爸爸》《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和《船媳》。有意思的是“编者的话”承认王一武的小说“稍嫌稚嫩”，但目录还是把韩少功的《爸爸爸》排在三个人最后，只是发表时排序提前，但还是在叶蔚林后面。该期杂志目录排在他们前面的小说家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宋学武、张波和李本深。“编者的话”认为三位湘籍小说家的小说“是从湘山鄂水吹送来的‘楚声’。湘山鄂水，民情乡俗，历历在目了”，“叶作精致美妙，凄婉含于清丽；韩作气度恢宏，冷峻出自洒脱；曲调音色各异，皆有沉郁凝重之意”，“几篇作品展示的生活图景。对于正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今日中国，既有严峻而清醒的回顾和反思，又有充满乐观自信的展望”。^①《新小说在1985年》同样认为《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行文凄婉清丽”，但强调小说的故事“怵目惊心”，“贫困、愚昧、礼教和习俗是怎样绞杀了五个天真懵懂的年轻女孩子，在她们死后人们又是怎样麻木不仁”。^②《新小说在1985年》评价《爸爸爸》是“峻冷”的风俗图，但容量惊人，“它像一把有许多个匙孔的锁，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③除此之外，还涉及《爸爸爸》语言表层和精神内涵、词组和久远的历史、人性与生存状态和文化氛围以及小说丰富多姿的叙事语态等等。对比了看，《人民文学》“编者的话”和《新小说在1985年》的短评，前者就浅，后者入深，且《人民文学》“编者的话”刻意将小说的非现实性，向“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接引。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④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提出文艺要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⑤新时期文学发生和发展与整个改革开放时代共享现代化的路线图，《人民文学》作这样的阐释，似乎在提醒韩少功和叶蔚林的两篇小说仍然在既有文学秩序和阐释系统之中。

①《人民文学》1985年第2期“编者的话”。

②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第488页。

③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第1页。

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⑤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1页。

无论是1985年当时,还是文学史叙述的后来,因为发表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且将其“放在了显著位置”,被作为《人民文学》提携文学青年、开拓进取的案例。另外一个例子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甚至有人认为1985年第3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改变了《人民文学》的形象。^①事实上,《无主题变奏》在当期刊物排序第三,排在它前面的是刘心武的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和理由的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这个位置能算显著吗?纪实小说和报告文学被放在比“显著位置”还“显著”的位置,至少反映《人民文学》在鼓励和提携青年文学探索的同时,也更主动地引领文学参与现代化时代主题的动向,而且在《人民文学》视野里,刘索拉和徐星的小说也是现代化时代主题的一个部分。《5.19长镜头》和《无主题变奏》同时入选《新小说在1985年》,也可以看出批评家吴亮和程德培当时理解的新小说之新,并不像后来某些文学史叙述所强调的只是寻根小说和形式实验的探索小说。《人民文学》“编者的话”认为《无主题变奏》“立意出新,实是对当前某些流行观念的一种反拨”^②。但反拨的是当前哪些流行观念,编者没有给出确指的答案。和《人民文学》不同,《新小说在1985年》为《无主题变奏》给出全书20篇小说中几乎最长的评语。在《新小说在1985年》编选者看来,《无主题变奏》显示了“一种真实”,“是坦率而出色的——用19世纪的文学史知识显然无法衡量这篇小说,更不要说用堂吉珂德精神了——它如实地记载了一个年轻平民的日常心态以及他对世事的嬉讽,他没有丝毫的伪饰,幽默得近乎冷酷”,“这篇小说没有故事,却有戏剧性。没有情节,却有高潮。它忠实地描写了这个年轻人的日常感觉和内心的调侃”。^③这则短评几乎可以直接移用到两三年之后的王朔,以及刘震云、方方和池莉的那些所谓还原日常生活的新写实小说。问题是,短评选择的参照系为什么是19世纪,是堂吉珂德,而不是20世纪,也不是中国的某个小说人物?《无主题变奏》文学可能性的未来前景没有被揭示出来。至于刘心武的《5.19长镜头》,《新小说在1985年》和《人民文学》,不约而同都以为问题文学(小说)“并没有过时”^④，“仍然具有生命力”^⑤。“并没有过时”也是一种“新”,这也许能够理解为什么叶蔚林的《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王安忆的《阿晓传略》、贾平凹的《天狗》等,包括《黄泥小屋》《炸坟》《狗头金》这些更像当时的汪曾祺、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等人地域文化小说的所谓寻根小说能够入选《新小说在1985年》。寻根小说在1985年前一两年才起来。1985年,真正代表寻根小说之“新”的,已经不是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的小说,而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新小说在1985年》为了避免和同时出版的《探索小说集》重复,舍弃了王安忆的《小鲍庄》。同样的原因,被舍弃的还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以及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这对标榜1985年小说之“新”的年选,无疑是重大的缺失和遗憾。《人民文学》对何立伟显然有所偏爱。一年两期,一长三短,四篇小说,且都是排在当期首篇。《人民文学》“编者的话”认为《花非花》“没有故事”,这种对小说形式感觉是准确的,但评价其“更在改革洪流中发现社会深层的前进力量”,则显然赋予时代命意得稍微牵强。相比较而言,《新小说在1985年》的短评认为其是“一首古韵十足的诗,不仅在文字上有中国画的气韵,而且整个的情感流露也体现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传统美学风貌”^⑥,则可算新事一桩。中国现代小说是西化的产物,但一直对中国传统小说资源念念在兹,也常常能够旧韵翻新声。前辈作家废名就把小说当作唐人绝句写过,何立伟同辈作家和古典小说传统隔膜得多,故而,阿城和何立伟向“旧”取径,无意造成的陌生感,却开了时代新风。事实上,他们和《探索小说集》的孙犁、汪曾祺、林斤澜和李庆西差不多是一个路数上的。

①朱伟:《亲历先锋小说潮涨潮退》,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第56页。

②《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编者的话”。

③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第64页。

④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第526页。

⑤《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编者的话”。

⑥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第93页。

三

《新小说在 1985 年》有署名吴亮的前言和署名程德培的后记。《探索小说集》则有 3 篇序和 1 篇吴亮和程德培共同署名的代后记。《人民文学》“编者的话”虽然可能是个人撰写,但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人民文学》的刊物态度。作为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创刊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一直承担着“国刊”的职责。观察《人民文学》历史,每一个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总能在《人民文学》得到及时应答,这是《人民文学》“主调鲜明”^①的刊物定位,1985 年自然也不例外。1983—1986 年,王蒙主编的时间不算最长。但 1985 年,无论对整个《人民文学》史,还是对王蒙个人的主编史,都是“突兀”的。当然可以认为王蒙躬逢一个“新小说”时代,但事实上,回应这个新小说时代的文学期刊除了《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中国作家》等可数的几家,其他数百家中国文学期刊在“新小说”之外。因此,与其说王蒙和《人民文学》躬逢新小说时代,不如是他参与发明了这个 1985 年新小说的时代。1985 年第 1 期《人民文学》“编者的话”指出:“本期作品体现了百花齐放的精神,又抒发了时代的强音。”^②研究者往往刻意强调 1985 年《人民文学》出格的一面,忽视其抒发时代强音的另一面,忽视其与普通读者的沟通和交流。可以作为参考的是 1985 年《人民文学》“我最喜爱的作品”的推选结果。按照《人民文学》每年发布的“我最喜爱的作品”推选说明。“我最喜爱的作品”,“由读者投票,列举自己所喜欢或比较喜欢的作品篇目(注明体裁,发表刊期),以得票多少为序,前二十名本刊公布。”读者参与文学建构和审美定义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一直到我们讨论的 1985 年,文学期刊基本上都有读者反馈的栏目。而 1949 年之后的中国文学,“读者”更是成为政治对文学想象和规约的广大群众基础,甚至有时文学的组织者和批评家也假借读者发言。《人民文学》“我最喜爱的作品”推选方式和它承担的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确立“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评奖方法一脉相承,就像当事人回忆 197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初选篇目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群众‘投票’最多和较多的”。^③《人民文学》1985 年度(第 1~10 期)“我最喜爱的作品”推选结果共 20 篇作品,其中诗歌一组,纪实小说一篇,报告文学 5 篇,小说 13 篇。查阅发现,所有“我最喜爱的作品”均为每期“编者的话”推介作品,且 13 篇小说有 9 篇为当期头题。^④1985 年《人民文学》第 1—10 期发表报告文学 12 篇,其中柯岩和乔迈发表两篇,即有 5 篇进入“我最喜爱的作品”,占其中的四分之一。考虑到《人民文学》1985 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的篇数是 110 篇,报告文学入选“我最喜爱的作品”的比例之高,值得注意。《人民文学》1986 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推选结果,报告文学 5 篇,另外还有 3 篇纪实小说,共 8 篇,几近半数。1987 年 11 月《人民文学》发布《“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百家期刊联名启事》,共同发起这次以“改革”为主题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的百家期刊囊括了《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花城》《钟山》《上海文学》等在内的全国文学期刊。在经典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线性叙述中,“一种文学的现代运动正悄悄到来”^⑤是新小说对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的僭越,而回到文学自身。这种僭越所指向的是审美文本被作为社会文本,体现在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它们都对应着社会转型期的公共议题。在大众传媒发育不充分的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文本作为社会文本一定意义上是大众传媒的替代物。文学报刊就是有

①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年,第 679 页。

②《人民文学》1985 年第 1 期“编者的话”。

③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87 页。

④阿城的《孩子王》目录排在李準的《瓜棚风月》之后,但正文排在第一位。

⑤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 1985 年》(前言),第 1 页。

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因而暧昧了文学专业传媒和普通大众传媒的边界。退一步说,我们承认1985年及其以后是新小说的时代,但这不妨碍作为新小说假想敌的旧小说也在尝试各种漆新的可能,包括向纪实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文类转场。在1985年,文学的转场现象,没有被充分关注的,还有经由电影、电视和广播电台放映和播出的文学衍生。因此,就这个时代文学的总体性观察1985年文学,不能轻易地以“新小说”代全体小说,甚至全体文学,进而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描述为先锋文学一枝独秀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1985年也是通俗文学复兴的年份。金庸和琼瑶等的港台通俗小说强劲登陆内地,同时诸多通俗文学期刊均在1985年创刊。“消遣读物大量刊行,文学园地颇受冲击。”^①这也直接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叙述。在目前主流的想象的“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文学”并没有通俗文学的位置,但是1985年通俗文学和消遣读物的“复兴”开启了文学和市场的通道,这条线索可以梳理到今天的网络文学。

回到1985年“我最喜爱的作品”,得票前三位的是贾平凹、刘心武和王蒙。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分别排第8、13名。同样被“编者的话”推荐的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张承志的《九座宫殿》、马原的《喜马拉雅古歌》^②未能进入“我最喜爱的作品”。^③是否因为这些小说都不能算作“时代的强音”?而且仔细研究发现,这些小说在“编者的话”几乎都是列其名式的一笔带过,或者将其和四个现代化、和改革这些时代的强音“现挂”,比如前面提到的《爸爸爸》等等。经由转化、软化、弱化和淡化等编辑策略,大多数“新小说”成为1985年《人民文学》“主调鲜明”下隐微的低语者。张光年日记1985年10月5日记载了一件事:“昨天冯牧点名批评的《人民文学》7月号上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冯牧斥之为‘垮了的一代’的文学,有一定道理。我看了吃惊,知道有些青年的思想可以走到这个地步,是值得注意的。”^④1985年,“主编”王蒙可谓支左佑右,“声势浩大的新小说运动的旗手”究竟是当时的事实,还是事后回忆者的想象和重构?

而《新小说在1985年》《探索小说集》的编选者吴亮和程德培,他们的身份只是新小说发现和发明的批评家,不是“国刊”主编,如其所言:“从一九八五年夏季起,德培和我着手进行新发表小说的相互推荐、评析、筛选、归类和存档的琐碎工作,并一直牢牢注视着各种文学期刊每一月度推出的新作。”^⑤其实他们不是1985年才进场的,“程德培对当代小说的关注已有七、八个年头了”^⑥,正是基于文学现场的充分田野调查,吴亮作出“一种文学的现代运动正悄悄到来”^⑦的判断。在吴亮这里,新小说的“新”首先是批评家自我漆新——新的精神层次、新的经验和新的叙述形式,“像是一部亟待修改的法典”^⑧。在他们的视野里,新小说是“小说家们创造了艺术中的新事实”^⑨。这些新事实具体而言就是《新小说在1985年》《探索小说集》两个选本。新小说之“新”是包容的,它是寻根的、现代派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是潮流的群体的,也是边缘的个人的;是大众的问题小说的,也是精英的形式革命的;等等。一切小说的“新”皆为我他新旧之别,而非纯杂之分。

说到新旧之争,自然需要进一步反思,所谓新小说是谁的新小说?首先,是谁在写新小说?就像当时的研究者指出的是“喝过‘狼奶’的充满着野性和生命活力的”,“三、四十岁的罗漠鲁斯们”,

①《人民文学》1985年第9期“编者的话”。

②莫言的《爆炸》和洪峰的《生命之歌》发表于第12期,不在推选之列。

③《人民文学》1986年第1期。

④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第678页。

⑤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前言),第4页。

⑥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前言),第3页。

⑦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前言),第1页。

⑧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前言),第2页。

⑨吴亮、程德培编:《新小说在1985年》(前言),第2页。

“他们大多是一些上山下乡过的知识青年”。^①因此,从文学代际的角度,“新小说”是新小说文本的诞生,也是新小说家的诞生。问题还应该包括这些新小说被谁定义、阐释和确认?在怎样的文学场域被定义、阐释和确认?再有就是新小说在1985年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

《人民文学》的支左绌右同样体现在《小说选刊》。“向读者推荐中短篇小说创作最新成果,为全国中短篇小说评奖提供候选篇目”一度被印在《小说选刊》的扉页。1986年第10期李国文取代葛洛担任《小说选刊》主编。同时,这两句话也从刊物消失。不过,这两句话不能说不是事实,因为《小说选刊》承担着评选工作。入选《新小说在1985年》的小说家除了李杭育、陈放、刘心武、马原和叶蔚林,都有小说被《小说选刊》转载,分别是: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第2期)、《冰炭》(第6期)、何立伟的《白色鸟》(第4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第5期)、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第6期)、张承志的《残月》(第7期)、莫言的《大风》(第8期)、王安忆的《小鲍庄》(第9期)、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郑万隆的《异乡见闻》(第10期)、韩少功的《归去来》以及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第11期)。这中间也包括《人民文学》1985年力推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李杭育的《沙灶遗风》这篇寻根文学前期代表作,《小说选刊》1984年曾经转载过,而叶蔚林的《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虽然迟到1987年第2期,也被《小说选刊》转载,这时的主编已经是李国文。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均没有被1985年葛洛主编的《小说选刊》转载。可以注意到的是,李国文担任主编之后不久,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沉思》(1986年第12期)、马原的《游神》(1987年第3期)和洪峰的《瀚海》(1987年第3期)等即被《小说选刊》转载。此后,《小说选刊》还转载过余华的《河边的错误》(1988年第5期)和《鲜血梅花》(1989年第8期)、格非的《风琴》(1989年第6期)以及王朔的《橡皮人》(1987年第1期),但不知什么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童的小说一直没有被《小说选刊》转载。如果依据这样的选刊目录,我们确实可以肯定《小说选刊》对新小说的推动和声援之功。但就像我们需要将新小说放在1985年整体的《人民文学》来看,《小说选刊》“选”是一回事,和《小说选刊》有关联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的“评”又是另外一回事。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共10篇,其中1985年6篇,分别是:《五月》(田中禾)、《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满票》(乔典运)、《今夜月色好》(彭荆风)、《窑谷》(谢友鄞)、《远行》(何士光)。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也是10篇,1985年入选3篇,分别是:《桑树坪纪事》(朱晓平)、《小鲍庄》(王安忆)、《你别无选择》(刘索拉)。因为是两年一评,要参照1986年的获奖作品,才能最后下判断。1986年获奖的4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没有一篇“新小说”,而1986年获奖的4篇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只有《红高粱》一篇算得上“新小说”,其余6篇皆为“旧小说”。两项相加,1985—1986年获奖的全国优秀短篇和中篇小说中的“新小说”只有《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小鲍庄》、《你别无选择》和《红高粱》4篇,占获奖比例的五分之一。1985年,《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远行》《今夜月色好》和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获奖,其中《今夜月色好》在当期的“编者的话”未有一字提及,而且也没有入选1985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

对1985年新小说定义的不只是这些批评家和期刊编辑,我们注意到1986年和《新小说在1985年》同时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1985小说在中国》。两个小说年选连书名都有些接近,但不同的是,《1985小说在中国》从它的“本书编委名单”看,是小说家自我定义的选本。19位编委,宋文郁和李庚来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可以不计。李陀是小说家,但他当时更重要的身份是新小说的推动者。故而,这个选本,李陀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需要进一步调查。除了他们3人,其余14人,都是小说

^①刘再复:《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为即将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所作的序言》,《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

家。小说家中,谌容、冯骥才、陈建功和乌热尔图四位出道稍早。其他10人都是1985年的新小说作者,即王安忆、陈村、阿城、张辛欣、郑万隆、贾平凹、韩少功、扎西达娃、史铁生、何立伟、张承志和莫言。考虑到冯骥才和李陀都是现代派的倡导者,陈建功的小说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谌容部分小说和新小说的近缘关系。^①《1985 小说在中国》虽然没有标明是“新小说”,但事实上是又一个“新小说”选本。这个选本入选的小说也是20篇,每人只选一篇。入选《新小说在1985年》的作者有10人和《1985 小说在中国》重合,但重合的小说只有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韩少功的《归去来》。《1985 小说在中国》附有除入选篇目之外的“编委推选篇目”42篇。对照这个篇目,只有陈放的小说不是入选作品,也不是编委推选篇目。从作者构成看,批评家定义的1985年新小说,和批评家认定的新小说家自我定义的1985年小说,基本一致。因为《1985 小说在中国》没有刻意强调新小说,蒋子龙等的人选不算意外。从另外一种角度,蒋子龙的1985年的《阴差阳错》和他此前改革文学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相比,显然也可以算得上他个人意义的1985年新小说。如果考虑到个人意义上的“新”,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许更应该参照蒋子龙入选。排在入选刊物前两位的还是《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分别是5篇和6篇,《收获》仍然只有一篇,《丑小鸭》两篇入选,超过《收获》《中国作家》和《北京文学》。《丑小鸭》是一家青年文学刊物。《丑小鸭》《萌芽》《青年作家》《青春》等青年文学刊物的活跃,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编委推选篇目,第一第二的还是《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除它们之外,《北京文学》入选5篇,《中国作家》4篇,《收获》3篇。以这两个选本看,相比较当时的数百家文学刊物,所谓新小说来源于不到20家刊物,基本集中在三五家刊物。无论怎么说,1985年的新小说已然是一个部分刊物、批评家和小说家的文学共同体。李陀曾经观察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小团体和“小圈子”,他认为改革引起市场经济的“猛烈的,甚至可以说发烧式的发展”,这种发展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固有结构中形成无数缝隙、裂纹,这些小团体、“小圈子”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公共空间”的雏形。^②戴锦华也认为:“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社会的同心圆结构经历多重裂变,已然蕴含着90年代的政治文化、消费文化,浮现着准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权力裂痕;蕴含着金钱作为更有力的权杖、动力的润滑剂的‘新神即位’;蕴含着文化边缘人的空间的‘位移’与流浪的开始,以及都市边缘社区的形成。”^③1985年新小说是主动的“位移”,是一次自我选择文学的某一部分成为边缘社区、小团体和小圈子的位移。

还可以看看1985年新小说之外的“小说”,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他者”对新小说边界的厘定。1985年11月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唐达成成为《瞭望周刊》撰写的《答客问》提交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之后近一年的文学情况,他举了一些代表主流的例子,其中包括:郑义骑自行车沿黄河进行考察,对沿岸的风俗人情、生活状况,以及近年的变化,都作了比较细致的了解;又深入太行山区,对那里人民的质朴生活和历史命运,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据此,写出了《远村》和《老井》等作品。湖南的孙健忠,长期在湘西土家族群众中生活,发表了长篇《醉乡》。陈村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采访几个月,写出《走过大渡河》等中篇佳作。张承志、张辛欣、郑万隆、谭力、张曼玲等等中青年作家,也都各自选择对他们有吸引力的地区,去实地了解生活,研究生活。他们“艺术上有新的追求,新的开拓,新的突破”,“寄托着作家们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除了这些青年作家,唐达成认为:“长篇还有矫健的《河魂》、柯云路的《新星》、刘心武的《钟鼓楼》等,都是有历史感而又有深度的力作,中篇则有陆文夫的《井》、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还有张辛欣与桑晔

^①谌容的《大公鸡的悲喜剧》入选《探索小说集》。

^②李陀:《1985》,李陀:《雪崩何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③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合作的纪实体小说《北京人》等。”^①唐达成认为1985年主流奔腾之外有支流和泥沙,他特别提到理论批评上对于时代精神,对于深入生活重要性的贬低,以及把艺术性与思想性对立起来,对文学的社会性加以否定的论调等。明显感到唐达成的批评指向的正是1985年的那些新小说,尤其是形式革命的新小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唐达成肯定的这些青年作家半数都出现在新小说的名单上。这些青年作家基本上是寻根和纪实倾向的。李陀认为:“‘寻根文学’公认的代表人物有汪曾祺、何立伟、阿城、扎西达娃、郑万隆、韩少功、贾平凹诸人,但还有一批作家的小说创作与‘寻根文学’有着相互影响、彼此呼应的密切关系,我以为也可以算做是‘寻根文学’的另一条线索,或另一种发展,如王安忆、张承志、莫言、史铁生、郑义等。”^②这份大名单就包括唐达成肯定的郑义、张承志、郑万隆等,这提醒我们注意1985年小说之新旧是否像我们想的那样泾渭分明?事实也许是我们刻意强调彼此的对抗,忽视了可能的相互汲取。有研究者梳理新时期文学十年主潮,从伤痕文学的反思到文化反思,“这种带文化性质的反省,从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到青年作家的‘寻根’思潮到产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③。而在李陀,寻根文学则出现在新时期另外的文学路线图上,这条线索比较接近唐达成所说的“支流”。在李陀看来,从汪曾祺《受戒》到何立伟到1985年的“寻根文学”的线索,正是寻根文学“使中国大陆的文学告别了毛泽东所创造的‘工农兵文艺’的时代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④。在李陀的新时期文学版图上,边缘即正义,边缘处在审美鄙视链的上游,他对主流文学评价不高,认为文学和新闻混淆不清,文学起着类似新闻的作用。“伤痕文学”和社会之间“互相激动、彼此唱和那种互动关系”。^⑤作为一个佐证,我们可以看他 and 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这个时间限定在1979年初至1983年春的小说选本,迟至1985年3月才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如果说,同一时间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选代表着时代主流,《当代短篇小说43篇》和这个主流重合的只有两篇,即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韩少功的《飞过蓝天》,包括他们自己的获奖小说《愿你听见这支歌》和《雕花烟头》。现在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李陀和冯骥才《当代短篇小说43篇》这个选本恰恰证明了他所说的“工农兵文艺”时代的多种可能性。正是有了这种多种可能性的存在,新小说一定意义上是在《当代短篇小说43篇》的历史延长线上,而同样的,“工农兵文艺”在1985年及其以后通过转场和涤新也在拓展自己的历史延长线。余华在1985年过去30年以后认为:“先锋文学之前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短短十年时间里中国几代作家所做的努力就是给予文学应有的丰富性,给予文学原本就应该有的,那时候中国的文学好比一个人的血管99%被堵住了,需要装上几个支架,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⑥这其实是承认积累和延续的变革,而不是断裂的取代,以此可以观察到改革时代中国文学走向自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1986年的《人民文学》取消了“编者的话”,代之以当代著名作家的一段话,第1期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的。巴金说:“有人问:文学的黄金时代是不是就要回来?我说,它会来,它一定要来。但是它不会自己走来,要迎来一个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应当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也包含着作家的辛勤劳动。空谈是起不了作用的。我的意见还是,大家团结起来再创作实践上争长短,比高低吧。”^⑦这段话出处是巴金发表于1986年1月6、7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的《再说“创作自由”》。新小说不

①唐达成:《答客问》,《瞭望周刊》1985年第51期。

②李陀:《1985》,李陀:《雪崩何处》,第93页。

③刘再复:《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为即将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所作的序言》,《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

④李陀:《1985》,李陀:《雪崩何处》,第92页。

⑤李陀:《1985》,李陀:《雪崩何处》,第91页。

⑥余华:《“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⑦《人民文学》1986年第1期。

是发生在文学实验室的,而是在由批评家阐释、文学刊物发表、读者阅读和评奖推选等各种力量构成的文学现场协商和斡旋中生成。正是新小说如此复杂的文学现场不同盘面的表现和反馈勾勒出“新小说在 1985 年”真实面目。所谓新小说,说穿了,只是新小说作家、新批评家(比如吴亮、程德培)和新编辑(比如朱伟)以及开明的文学组织者(比如巴金、严文井、李子云、茹志鹃、王蒙)等共同的圈子里的文学。新小说在国家评奖和普通读者的边缘化,说明其社会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与此相关的,新小说的定义、阐释和确认的新小说家、新批评家和新编辑等在 1985 年之后渐渐地、现实地控制着文学史叙述。他们在文学史叙述中对 1985 年“新小说”进一步做减法,仅仅保留形式革命的部分,其结果是 1985 年新小说将如黑暗中的手电筒的光柱般被突出地“亮”,而被做减法的新小说部分,以及更复杂和广大的 1985 年“旧小说”则可能不被他们的文学史看到,渐渐地,文学史的 1985 年蜕变为新小说的 1985 年。

(责任编辑:张 升)

The New Novels in 1985 Revisited

HE Ping

Abstract: *New Novels in 1985* is an annual novel anthology co-edited by Wu Liang and Cheng Depei. The discussion of the new novel in this paper is not limited to this anthology. What was new about the new novel? By whom was it defined, interpreted, and confirmed? In what literary field was it defined, interpreted, and confirmed? How influential was the new novel in 1985? Putting these questions into perspective,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reconstruct the new novel and the literary scene in 1985. The new novel was not just the result of a formal revolution in the literary laboratory, but a shaping and constructing process in which various forces worked together, involving the writers' conscious literary practice, the critics' interpretation, the publication of literary journals, the screening of the anthology of the selected works, the readers' reception, and the nomination and selection of literary awards. The new novel has not only provided a new sample of fiction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confirmed and identified the writers and literary circles it imagines. Although the literary-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novel embodied in the statement "Time has begun" is only "a synchronic section exposed at the fracture of history" and is a natural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 in novel writing in the new age up to 1985, it is also the opening of a new chapter to the future.

Keywords: new novels in 1985; revolution in novel writ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bout the author: HE Ping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